

文化坐标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

——以湘西苗族为例

欧阳国辉,王 强,何晔颖

(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少数民族传统民居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当今对其进行保护与转化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展开。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可以运用符号学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面构建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符号识别体系,并结合时间与空间维度组成的文化坐标视角,遵循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真实性、可识别性、居民认同的保护原则,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以象达境的更新方法,以期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转化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湘西苗族;传统民居;文化坐标;建筑符号;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TU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3-0132-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3.014

The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in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Dwell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ordinates: Taking the Miao Nationality in Xiangxi as An Example

Ouyang Guohui, Wang Qiang, He Yey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require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both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Taking the Miao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Xiangxi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semiotic theory, its symbol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levels: discourse, syntax, and context. Meanwhile, the study has been don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by combining the cultural coordinates of time and space, with the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of the symbols' authenticity, recognizability and resident identification, and applying the renewal methods of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posi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imagery to reach realm.

Key words: Miao nationality in Xiangxi; traditional dwellings; cultural coordinates; architectural symbols; modern 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2023-0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BA005);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1SS104);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1SS101)

作者简介:欧阳国辉(1968—),男,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建筑设计与理论、乡村保护与再生设计等研究;
王 强(199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设计;
何晔颖(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设计。

一、文化坐标与民居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作为少数民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表征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活着的文化遗产^[1]。这种“活着”，一方面，表现为时间线上不间断地继承与演进，是历史创新地“活着”；另一方面，体现在空间地域上不停息地交流与碰撞，是民族互相交融地“活着”。因此，对传统民居进行活态保护需要同时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着手。

国内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的。一是从时间维度对民居的特征与价值进行梳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居的建造形制与营造智慧、空间组合与格局演变、文化价值与保护路径等方面^[2-4]。李哲、陈斯亮等针对湘西苗族民居平面与堂室格局深入进行实地考察，归纳总结出其历史演进的规律与机制^[5-6]。汤诗旷阐释苗族传统民居的火塘空间的功能、形制与精神属性，突出火塘对苗族家庭空间秩序与文化识别性的作用^[7]。彭晓烈、李喆等提出少数民族村寨的未来走向应是“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8-9]。二是从空间维度对民居的保护方法与更新实践进行研究，主要是以常青院士的“历史再生理论”^[10]、王澍等的传统营造的现代化实践以及吴志宏等的乡村社区活化策略等成果为代表^[11-12]。近两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将传统民居保护和改造作为发展重点，但在村民与空间功能的关系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针对湘西地区传统民居的现代转化设计亟待加强。

对传统民居的现代保护和转化要从历史传承的时间维度和时代发展的空间维度所构成的文化坐标中来把握。如图 1 所示，图的纵向表示历史的传承（即时间维度），横向表示时代的发展（即空间维度）。可以说，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从纵向上获得了延续，在横向上正不断创新。当今社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文化场域中的少数民族民居保护和转化，始终贯穿在本土与外来、主流与支流、传统与现代等关系的对立、调整

与结合中。本文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从文化坐标视角分析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并提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保护与转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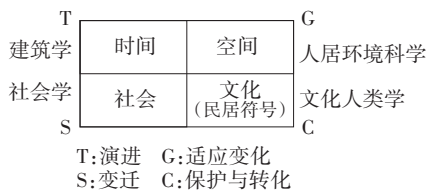


图 1 时空维度民居文化符号的保护与转化

二、民居符号的历史演进

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谈到文化的本质时曾指出，“所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是符号系统，或者说，文化可以理解为交流。”^[13]由此可以说，文化之间的交往，其实就是符号之间的交往，传统民居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符号。20 世纪 50 年代，建筑师们致力于为抵御“国际式”建筑寻找“地方性”，用“区域语”代替“世界语”，建筑的地域特征被作为焦点集中研讨，符号学在建筑设计创作中被广泛应用。随着这种研讨的不断延伸，建筑符号的内涵也不断得到扩展，从最初单一的建筑形式拓展到建筑语义、形式、代码、传播等特征。其中，有关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是研究符号传播的关键，“历时性”侧重单一符号在时间维度下持续演进的活动序列，而“共时性”强调符号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符号间的碰撞与交流，这与文化坐标中的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可见，任何一种符号的发展毫无疑问都受到时空坐标的双重影响。

（一）民居符号的组成

传统民居是物质化、技术化、功能化的艺术，拥有系统且独特的符号体系。一般来说，民居主要是由形态、空间等形制符号与屋顶、挑手、门头等造型符号构成，此类符号则经过长时间演化形成固化且显性的建筑基因，是民居符号的历史传承，也是地域文化的直接反映。此

外,建筑内的各种符号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多种可以被感知的复杂关联,其构成方式类似于语言学中的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有关学者将此引申为建筑符号语法,并认为这是建筑符号体系形成的逻辑基础。就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建筑最终是以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与外界环境发生信息交换,二者相互影响构成建筑的语境。该语境强调“立象以尽意,境生于象外”,人们通过建筑符号表达设计意象,“象”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而“境”是抽象

的,需要感悟的。中国的传统民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境”,而四合院、土楼、吊脚楼等建筑类型只是追求“境”的手段和途径的“象”。因此,语境可以说是建筑符号体系创造最终价值的体现。笔者通过对湘西地区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16 个苗族村落进行调研(如表 1 所示),并以此为基础对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进行分类,并逐个进行讨论后揭示了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符号在文化坐标中的演进规律(如图 2 所示)。

表 1 16 个苗族村落:调研数据来源

村落名称	地理位置	建成时间	民居特征	聚落类型
莲花池村	怀化沅陵县	元代	合院式布局,穿斗式,一层建筑为主	山脚型
翁草村	湘西古丈县	清代	独栋布置,木房青瓦	山脚型
龙鼻村	湘西古丈县	明代	合院式布局,有主屋、辅屋之分,院门西南角	滨水型
夯沙村	湘西保靖县	明代	穿斗式木房青瓦,五柱六瓜、五柱七瓜,三开间	滨水型
夯吉村	湘西保靖县	明代	布局零散,材料以木材为主,穿斗式平座屋	交通型
吕洞村	湘西保靖县	元代以前	依山就势,平座屋、吊脚楼,木房青瓦	山坡型
芷耳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环状布局,木房青瓦,穿斗式构架	山脚型
金龙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山顶建村,背靠悬崖,村落隐蔽	防御型
板栗村	湘西花垣县	清代	“品”字型布局,木房青瓦,穿斗式构架	山脚型
坪朗村	湘西吉首市	明代	滨水苗寨,布局紧凑,单栋布置	滨水交通型
德夯村	湘西吉首市	清代	穿斗式,木房青瓦,临水而建	山脚旅游型
十八洞村梨子寨	湘西花垣县	明代	依山就势,单栋布置,材料有木材、砖石、青瓦等	山顶型
扣岱村	湘西花垣县	元代以前	砖木混合结构,砖石土墙	防御型
早岗村	湘西凤凰县	清代	依山就势,砖木混合,独栋布置	山坡型
老洞村	湘西凤凰县	明代	宅院布局,砖石土墙,存有保家楼、栅子门等防御型建筑	防御型
夯来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木房青瓦,生活模式传统	山脚“生苗”型

(二)民居符号的演进规律

1. 符号语汇演进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4]任何建筑都必然具备一定形态以围合分割形成空间,达到形态为实、空间为虚、以实围虚的效果。这里的“实”是传统民居最基本的符号,是体现居之本原的符号——构架,同时也是世代传承最稳定的符号。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构架多为穿斗式,经历了

从满瓜满枋到减枋跑马的演进历程(如表 2 所示)。所谓减枋跑马,是指在满瓜满枋构架基础上将落在枋上的瓜柱底部升高,减去其下穿枋的做法;满枋跑马则是指在瓜柱升高后不减枋的做法,此类做法是对穿斗式构架的继承和精简。除构架外,围护结构也是打造民居空间必不可少的因素。苗族传统民居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利用湘西多山多林的地形,围护材料以木、石、土为主,进而形成木板壁、竹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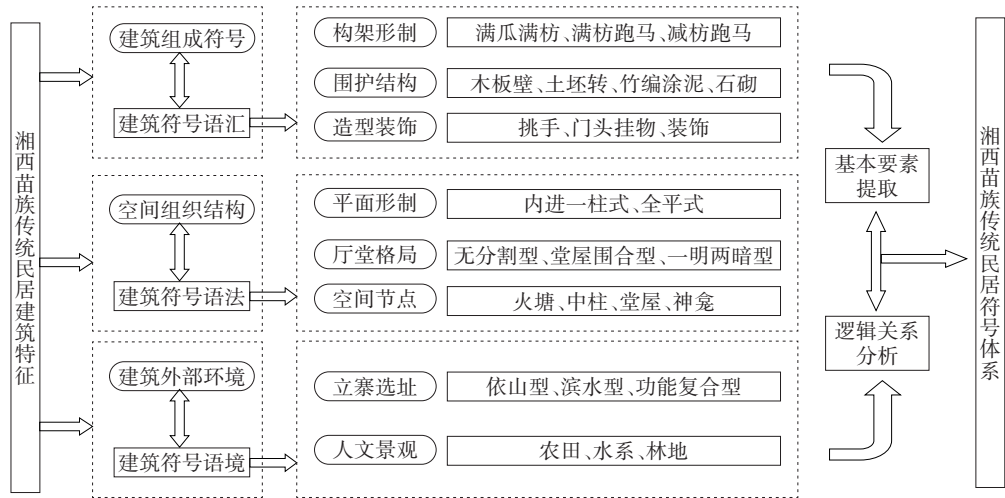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坐标中湘西苗族传统民居建筑符号体系的组成及演进规律

表2 民居构架符号演变

构架符号类型	图示	演变特点
满瓜满枋		1. 对穿斗式结构的精简,节约了材料的消耗,但比例尺度等特征变化不大。 2. 对阁楼空间的利用率逐渐变高,增加储物空间。
满枋跑马		
减枋跑马		
双挑减枋跑马		

泥墙、土坯砖等围护结构符号。此外,装饰图案、门头挂饰、屋顶形式、构件形态等视觉冲击强烈的符号都是民居中能够促进稳定传承的建筑符号,具有鲜明的识别性。民居建筑符号语汇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构架、围护结构等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居住空间的符号,这类符号受到传统技艺与材料的限制,对居民保温、通风等现实需求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多是在大框架下进行细微调整,创新性程度不高;另一类是装饰、屋顶形式等在构建民居空间中起到次要作用的造型图案符号,这类符号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识别性,不会直接影响民居的居住作用,对创新性更没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在苗族传

统民居符号的发展历程中,其建筑语汇的历史演进更注重历史维度的单向传承。

2. 符号语法的演进

建筑中的符号语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形成建筑空间,不同地域因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排列方式也不相同,对传统民居而言,主要体现在平面形制与厅堂格局的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现存苗族民居的平面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结合民居的建成时间与相关资料推测出平面形制的演变过程,即室内无分割型→堂屋围合型→一明两暗型(如图3所示),借助文化坐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探究其演变原因。苗族文化对自然与鬼神极为崇拜,在平面布局中会着重注意对祭祀空间的安排,其中主要有“爬贵”(猪神)、雌公雌母、祖神(家先)等祭祀对象,最早的“室内无分割型”平面形制便是为了满足室内祭祀所用大空间的需要。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与“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之后,湘西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苗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鬼神观念发生变化,祭祀活动逐渐由室内变为室外,进而出现了“堂屋围合型”与“一明两暗型”民居平面形制。这两种平面形制仅在堂屋设神龛以祭祀祖神,也更为关

注现实居住人的需求。此外,还有村民在民居一侧搭建厨房、厕所等附属用房,称为“拖步”。从民居平面形制的演进可以看出,与有物质存在的语汇不同,民居的符号语法是“无形”的逻

辑关系与意识形态,这种关系并不稳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居民意愿的改变而改变,这也使得民居的符号语汇成为民居时代价值的体现(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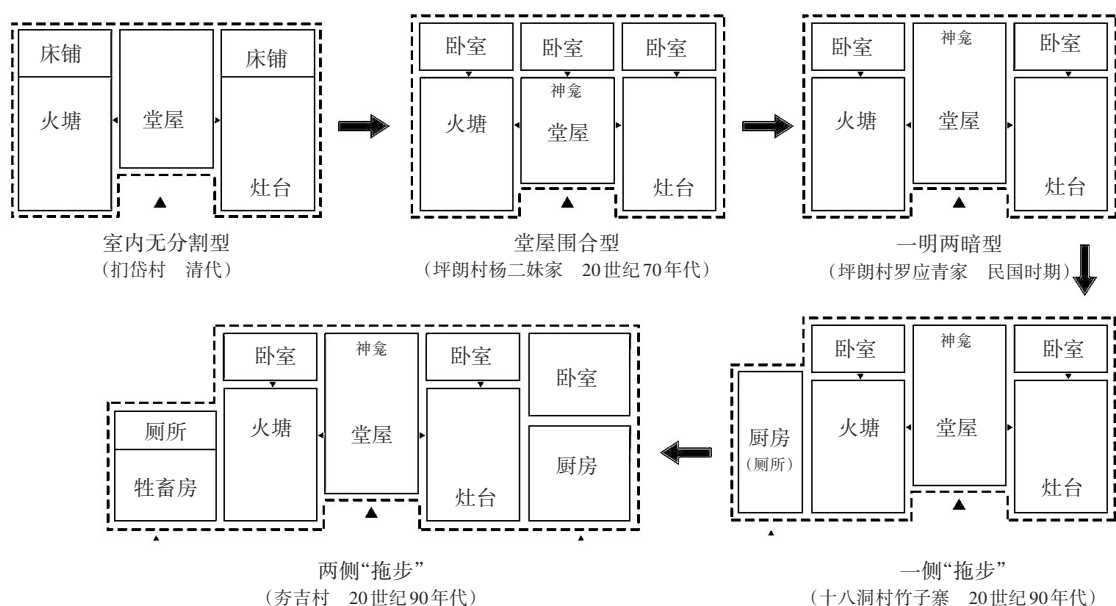


图3 湘西苗族民居平面格局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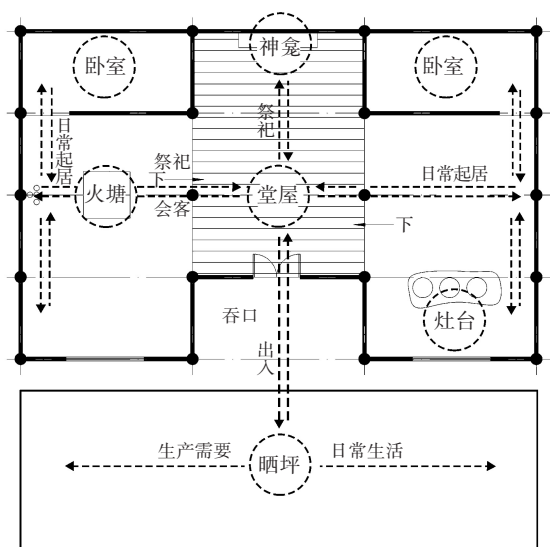


图4 湘西苗族民居平面组织流线







3. 符号语境演进

建筑学是关于人居环境的科学,民居不仅与人的生活模式相互关联,还与环境产生交互,二者相互适应才能构成有机整体。环境有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分,由此,湘西苗族传统村落

可分为以自然环境主导的依山型、滨水型村寨与以人文环境主导的功能复合型村寨(如表3所示)。依山型与滨水型多考虑到生活的需求,村民自发选择靠近水源和耕地的地址,民居也多退让田亩,呈线性或多簇式布局。这也反映了苗族居民自觉规避危险、力求安稳的心理。从秦汉时期的“五溪蛮”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湘西苗族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村落或依山而建,居高临下;或隐于山谷,匿影藏形。与依山型、滨水型不同,功能复合型村寨多是人为的强制设立,清代多有“红苗强悍,凭险蟠结”的记载,清廷也曾多次出兵湘西苗疆,苗人为抵抗清军,特地选择军事要塞进行屯兵,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演变出以军事功能为主导的村落。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型、商贸型等功能复合型村落。除生活需求与功能主导之外,苗族民居的选址还引入占卜与五行术数的概念,这是对自然敬畏的体现。从文化坐标来看,苗族传统民居与环境的关系是紧密的,并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意境随着历史纵向传承下来,形成了苗族民居的居住智慧。但这种人与环境的和谐也会受到那个时代的横向影响而发生改变,比如军屯、交通等功能复合型村落的出现。

表3 湘西苗族民居类型及聚落特征

民居类型	村落名称	空间肌理	聚落特征
依山型	吕洞村		村落位于山地南坡,民居沿等高线呈阶梯状分布,梯田与民居融为一体
	翁草村		村落处于较缓的山坡处,民居沿等高线集中分布,在村落四周开垦梯田
	龙鼻村		村落背山面水,民居集中分布在山脚处,在河流处开垦少量耕地
滨水型	坪朗村		村落处于洄水湾处,背山面水,紧凑分布
	金龙村(防御型)		村落位于悬崖峭壁之上,进出只有一条道路且不易察觉,隐秘性极强
	夯吉村(交通型)		村落以交通为主要因素进行选址,民居沿道路呈带状分布,梯田位于民居外侧

三、民居符号的保护原则与转化设计

从文化坐标视角出发,探究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演进规律,不难发现,民居的建筑符号语汇、语境更多体现纵向历史传承,而民居符号语法更多是对横向时代发展的适应。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风貌进行保护,要放在“发展—衰败”“当下一历史”的时空文化坐标中,既要保护好民居文脉的传承,也要满足当代居民的需求,最终实现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的可持续性保护与转化。

(一)民居符号保护原则

苗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源于其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并在纵向历史传承中得到演进,当今多元化社会更应该重视民居符号的延续以促进民族识别与认同。首先,保持民居符号的真实性原则,这是建筑特征延续的前提。真实性并不是简单地对民居符号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符号能够继续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生活模式与需求,延续人与建筑相互适应的和谐关系。因此,在对传统民居进行更新和保护时,不能一味地排斥村民对新材料、新结构的使用;相反,村民的自发性建设活动恰恰更能体现人对建筑的选择性倾向。其次,保护民居符号的可识别性原则,这是符号延续的关键。湘西苗族传统民居有其独特的建筑符号体系,我们既要站在历史传承的角度对民居符号进行解析与分类,确保民居识别特征的延续性,也要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对民居符号进行转化与更新。一方面,对装饰图案、构件造型等较小影响居住空间的符号要进行纵向历史传承的原真性保护;另一方面,对构架、墙体等决定性影响居住空间的符号要进行可识别的现代转化,运用新材料、新结构等对传统民居符号的肌理、比例、尺度等要素进行再现,彰显传统民居符号的时代价值。最后,实现居民的自我认同原则,这是保护民居符号的最终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与缔造者,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只有居民认可的符号才能得到居民自发地继承。在当今多元文化社会中,对传统符号进行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以期唤起居民对民居保护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当地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居符号转化设计方法

第一,基于符号语汇的要素转换。一是同形异质。“形”即民居符号的符形,是民居给人

的整体感受与形态、尺度、色彩有关;“质”是指组成符号的基质,即建筑材料、肌理等。赋予民居符号时代价值,意味着在保存其形态识别性的基础上要对符号的基质进行创造性转化,即对传统民居符号的材质、肌理等进行替换,形成同形异质且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号,如用混凝土替代原有土坯砖。民居符号对于使用者与所有者而言,具有功能与识别的双重属性,但对于非使用者与非所有者来说,则只具有识别属性,当今频繁的信息交流强化了这一特征,我们见到的建筑数量要远远大于我们居住过的建筑。这使得社会对民居符号的识别性更为关注,即大众更关注民居符号的可识别特征,关注民居符号的民族地域形式,这也是提出“同形异质”方法的原因之一。“同形”,一方面是从纵向历史传承上保持其识别特征;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民居符号更好地得到关注、传播与保护。“异质”侧重使用者功能性的需求,运用新材料在保温、通风等方面对民居符号进行改造,满足村民的现代生活需求,赋予民居符号时代价值。二是位置重构。在民居符号的诸多语汇中,除了对其自身进行“同形异质”改造,还可以对符号语汇之间的关系进行“位置重构”,即对符号在建筑中的位置进行重新排列。张永和吉首美术馆的设计便运用了这一手法,将原本在屋顶上的“瓦”放在了墙的位置进行位置重构,在现代建筑中重现了传统民居中檐下滴雨的场景,这是对“瓦”这一传统符号意境的传承。此外,这种方法还经常被运用到民居封火墙符号的处理上,把原本位于山墙位置的封火墙放在建筑的正立面作为入口的装饰,突出符号识别特征。“位置重构”既有对传统民居符号意境的历史传承,也是对民居符号的时代创新。

第二,基于符号语法的秩序重塑。传统的苗族民居平面以祭祀空间为核心组织,但随着当下村民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的改变,原有民居组织形式不能满足村民的现实需求。因此,新

建民居要以人的现实需求为核心,符合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空间的私密性、各类功能空间的合理性以满足居民现代心理需求。此外,还要注重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利用公共文化空间串联民居聚落组织,唤醒居民的群体认同。

第三,基于符号语境的意境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刻自古便采用“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等符号处理手法,建筑中的符号也适用于此,湘西民居中常用的枫树、太阳等装饰符号都是对自然景物的取象;民居往往隐藏于山谷、山林之间营造出隐蔽的环境,这种村落格局会带给村民心理安全感。但在当今乡村振兴与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更全面、更开放的处理手法,不能只局限于对民居符号形象、意象的再现,更要注重深层次居民生活愿景的表达,以村民现代生活需求为重心,统筹建筑与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和设计,进而为居民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状态。

四、结论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符号是经过长时间演进而来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也是民居地域性、民族性的外在表现。保持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特色,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从纵向时间维度与横向空间维度整体把握,遵循“识别——转化——认同”的路径。首先,要对少数民族民居特征进行识别,从历史角度梳理民居构架、材料、形态、装饰等固化且显性的符号语汇,并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要素转化;其次,要以符号构成语法为基础,以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为核心,结合时代特征,对民居的空间构成语法进行秩序重塑;最后,要根据民居与环境组成的符号语境中的意境进行整体设计,为居民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生活状态,实现民居符号的现代转化,唤醒居民的文化认同。湘西苗族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是针对民居地域特征的活态保护提出的,需要社

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总之,重视人的发展、景观的保护、产业的振兴,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欧阳国辉,杨春蕾.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乡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策略: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硐村为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2-109.

[2] 娜仁琪琪格.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J].人民论坛,2022(4):123-125.

[3] 杨大禹.传统民居及其建筑文化基因的传承[J].南方建筑,2011(6):7-11.

[4] 刘斯阳,唐西娅.湘、黔苗族民居文化对比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9(7):36-38.

[5] 李哲,柳肃,何韶瑶.湘西苗族民居平面形式的演变及原因研究[J].建筑学报,2010(S1):76-79.

[6] 陈斯亮,李晓峰,汤诗旷.湘西传统民居堂室格局的类型与变迁[J].建筑学报,2022(2):82-87.

[7] 汤诗旷.苗族传统民居中的火塘文化研究[J].建筑学报,2016(2):89-94.

[8] 彭晓烈,高鑫.乡村振兴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60-64.

[9] 李喆.民族与时代整合:传承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合理更新机制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7(9):106-109.

[10] 常青.过去的未来:关于建成遗产问题的批判性认知与实践[J].建筑学报,2018(4):8-12.

[11] 王澍,秋落.那山 那水 那村:浙江富阳文村改造[J].室内设计与装修,2016(11):86-91.

[12] 吴志宏,吴雨桐,石文博.内生动力的重建:新乡土逻辑下的参与式乡村营造[J].建筑学报,2017(2):108-113.

[13] [英]G·勃罗德彭特,等.符号·象征与建筑[M].乐成名,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5-6.

[14] 伍端.空间句法相关理论导读[J].世界建筑,2005(11):10-15.

(上接第 24 页)

[2]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1.

[3]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9-15.

[4] 刘建武.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 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8.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6] 列宁.列宁选集(第 4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5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1.

[8]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20-132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95.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11]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1.

[12]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7.

[1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107.

[14] 列宁.列宁选集(第 2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1.

[15]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496.

[1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1.

[1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3.